梵语文学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

张远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外的印度学研究深入发展，在梵语史诗、古典文学等传统研究稳步推进的同时，研究的触角也伸向了宗教史、文化史、物质史、科技史等各类文献的交叉领域。本文拟从传统的梵语文学研究、梵语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和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这三个方面，择要评述国外近年来出版的相关专著和研究成果。

关键词　梵语文学　交叉学科　研究现状　前景展望

拉达瓦拉布·特里帕蒂（Radhavallabh Tripathi）在 2012 年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梵语研究六十年（1950-2010）》（*Sixty Years of Sanskrit Studies, 1950-2010*, 2012）[①]。书中提供了大量与梵语研究相关的学术资料，尤其是事无巨细地网罗了印度本土的梵语研究成果。然而这部著作的优势也恰恰是其缺陷所在。第一，在编排上，该书以地域为标准，第一卷讲印度本土梵语研究成果，第二卷讲印度之外其他国家的梵语研究成果。其中第一卷又以地区分类，总计十八个地区。这样的编排方式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体现了一定的印度学术特色，但无疑并非最优。尤其对不是以印度的区域研究特色为重心的学者而言，这样的划分打乱了梵语研究学科的内在逻辑和时代沿革，反而显得凌乱琐碎。第二，全书在侧重点的把握上也存在问题。印度本土的研究成果四百余页，甚至连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尚未毕业的学生名单都囊括在内，而其他十三个国家，篇幅却只有区区三百余页，每个国家基本都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尤其讲到中国的三十页里，回顾了中国古代译经和梵语传入的历史，但对于近六十年的发展概况只字未提。这极大程度上体现了印度学者的爱国热情，但并非学术上的忠诚。

鉴于这本当代梵语研究学术史既不具备普遍适应性，也无法满足梵语文学研究者的学术需要，尤其并未涉及 2010 年之后的最新成果，笔者于 2015 年 4 月至 6 月间在哈佛大学的各大图书馆围绕梵语文学研究收集资料，收获颇丰。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拟从传统的梵语文学研究、梵语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和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这三个方面，择要评述国外近年来出版的相关专著，为国内学者介绍梵语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以期对国内印度学之发展有所助益。

[①] Tripathi, Radhavallabh. *Sixty Years of Sanskrit Studies, 1950-2010*. New Delhi: Rashtriya Sanskrit Sansthan, 2012.

一、传统的梵语文学研究

当代梵语文学研究的首要特点是传统梵语文学研究的继续发展。梵语史诗和古典文学作品被一再重印和不断研究。这类研究一方面秉承文献学的传统，包括校勘、注释、翻译、读解等基础内容，另一方面则具有与西方现代理论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特色，并力求对经典文献做出新的阐释。

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性与《圣经》、《古兰经》、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希腊悲剧相当。[①]《摩诃婆罗多》被公认是研究南亚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的最重要资料，而且被认为是印度传统中正法的主要载体。确实，正法的微妙特性是《摩诃婆罗多》的中心主题，然而，即使再草率的读者也会发现，这部书并不热衷于正法，而是对僭越正法的多种方式更感兴趣。毕竟《摩诃婆罗多》讲述的是一个野蛮的手足相残的战争，结局是世界几乎被毁灭。贞洁的王后被她丈夫的兄弟侵犯。天神下凡人间，用推行正法的外表鼓励高尚的人说谎和欺骗。（*Disorienting*: 3-4）

哈德孙（Emily T. Hudson）的《令人迷惑的正法——<摩诃婆罗多>中的受难伦理和美学》（*Disorienting Dharma: Ethics and the Aesthetics of Suffering in the Mahābhārata*, 2013）正是探讨《摩诃婆罗多》中的正法（dharma）和苦难（duḥkha）的关系，并认为苦难是史诗伦理中最重要的美学基础。全书包括导论、五个章节和结论。导论首先介绍《摩诃婆罗多》的背景和文学特色，进而讨论其中的受难美学。（*Disorienting*: 7）第一章运用欢增（Ānandavardhana，九世纪）的韵（dhvani）、味（rasa）、敏感受众（sahṛdaya）等理论分析《摩诃婆罗多》中的受难美学。第二至五章考察受难美学如何通过重塑人物对苦难的理解来改变敏感受众对世界的理解，同时探索这个重塑的暗示以确定《摩诃婆罗多》中正法的含义。第二章集中探讨掷骰子游戏失和的场景带来的受难，并从黑公主的反抗引出正法和苦难的冲突。第三章分析持国的形象。盲眼国王持国是受难美学的核心角色，因为他同时是苦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第四章关于时间的主题，分析通过对时间的操纵产生或消除苦难。第五章考察史诗中的其他重要主题，例如命运与个人努力的关系，业报和神旨的关系等，认为史诗以迂回的启示和戏剧化的形式处理这些关系，抛弃了直接的方式，或许是史诗对于苦难由来的最好解答。（*Disorienting*: 47-49）

[①] Hudson, Emily T. *Disorienting Dharma: Ethics and the Aesthetics of Suffering in the Mahābhārat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引文，将随文标出该书标题首词（*Disorienting*）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阿尔夫·希尔特贝托（Alf Hiltebeitel）早在 1999 年时就指出，之前对《摩诃婆罗多》研究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将这部史诗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解读。（*Disorienting*: 5）梵本《摩诃婆罗多》有几个突出的文学特色。首先是卷帙浩繁，其次是框架结构，这二者相辅相成。再次是谜一样的情节设置。《摩诃婆罗多》提出问题，但并未给出答案。尤其是关涉人类行动的力量和道德的复杂性这两个问题。人类的行动有多大程度是自由的，又有多大程度被时间或命运胁迫？在何种程度行善或遵从正法可以带来幸福？如果正法不能带来幸福，甚至会招致痛苦，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遵从正法？谁将为《摩诃婆罗多》的战争、灾难和几近毁灭的世界负责？（*Disorienting*: 21-23）最后是无情地讲述阴暗的故事。战争持续了五卷。杀戮的细节被刻画得无微不至。尤其大屠杀当晚，士兵在睡梦中被杀死，毫无战场上的尊严。《摩诃婆罗多》是对于读者（或听众）扯去任何遮掩和防护的反复的赤裸裸的袭击，因而传统认为《摩诃婆罗多》不应在家中诵读，而应在露天的场合，因为它的摧毁力量过于强大。（*Disorienting*: 25-27）

相较于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分析《摩诃婆罗多》，拉奥（Ajay K. Rao）的《作为神学的〈罗摩衍那〉重塑——前现代印度的接受历史》（*Re-figuring the Rāmāyaṇa as Theology: A History of Reception in Premodern India*, 2015）[①] 则是从宗教文献的角度解读史诗《罗摩衍那》，将之运用在虔诚派运动和政治事件的论战之中。中世纪后期的神学诗歌、十六世纪兴起的罗摩崇拜、罗摩形象在政治中的投射、后殖民形态传媒对于史诗的情感回应等，都反映了《罗摩衍那》作为宗教文献而非历史文献或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②]

二、梵语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

当代梵语文学研究的另一个更为显著的特点是向交叉领域的拓展，之前未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梵语文献及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日益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印度文学与宗教、哲学、神话等学科密不可分。梵语文学更是如此。在交叉学科研究语境下的梵语文学研究，首先是文学与宗教的交叉，又可以分为文学与宗教的结合和宗教文学研究两类。

（一）文学与宗教的结合——以梵语戏剧文学为例

梵语戏剧是集韵文、散文、对话、歌舞、表演、服饰、祭祀等元素于一身的综合

[①] Rao, Ajay K. *Re-figuring the Rāmāyaṇa as Theology: A History of Reception in Premodern Ind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②] Rao, Ajay K. *Re-figuring the Rāmāyaṇa as Theology: A History of Reception in Premodern India*, pp. 122-123.

艺术，也可以说是梵语古典文学中与宗教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类别。《舞论》第一章讲述戏剧起源时，称以因陀罗为首的众天神恳请梵天创造一种既能看又能听的适合所有种姓的娱乐，梵天于是以四吠陀和吠陀支为来源，从《梨俱吠陀》中撷取吟诵，从《娑摩吠陀》中撷取歌唱，从《夜柔吠陀》中撷取表演，从《阿达婆吠陀》中撷取情味，创造了名为戏剧的第五吠陀。戏剧吠陀导向正法、利益、名誉，包含训诫和历史传说，具有一切经典的要义，展示一切技艺，展现一切世事。[①] 从传说中的戏剧起源可以看出，戏剧从诞生之时就与宗教密不可分，发展之中更是与宗教仪式相伴。

比斯瓦斯（Bhagirathi Biswas）的《梵语戏剧掠影（第一卷）》（*Sanskrit Drama at a Glance Vol. I*, 2013）[②] 分四章概述梵语戏剧的历史和沿革。第一章介绍梵语戏剧的产生、发展、分类等背景知识。第二章介绍跋娑（Bhāsa）、迦梨陀娑（Kālidāsa）等二十二位十四世纪之前的古典梵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第三章介绍现代梵语戏剧，包括六十三位现代梵剧作家及其作品。第四章讨论梵语戏剧对孟加拉语、印地语戏剧和泰戈尔创作的影响。这是一本不十分厚的小册子，可以作为了解梵语戏剧全貌的入门书。对于卷帙浩繁的梵语戏剧来说竭泽而渔几无可能。书中以传说剧、创造剧这两个比较成熟的类型为主，并未涉及笑剧和街道剧的内容。

梵语戏剧分为十个主要类型，分别是传说剧（nāṭaka）、创造剧（prakaraṇa）、神魔剧（samavakāra）、掠女剧（īhāmṛga）、争斗剧（ḍima）、纷争剧（vyāyoga）、感伤剧（utsṛṣṭikāṅka）、独白剧（bhāṇa）、笑剧（prahasana）、街道剧（vīthī），合称“十色”。梵语戏剧往往基于史诗和传说，远离社会和政治，批判性也相对薄弱，但是笑剧和街道剧则与现实非常接近。笑剧以其特有的幽默元素揭露社会中的腐败方面。街道剧常常以两三个角色演绎所有味，用以唤起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两类戏剧短小精悍、主题鲜明、场景简洁、人物关系简单、适于舞台表演，深受观众喜爱，至今仍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地区上演。[③] 例如《薄伽梵和妓女》（*Bhagavadajjukīya*）和《醉鬼传》（*Mattavilāsa*）这两部笑剧就兼具娱乐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而今仍具现实意义，因为数百年来，生活和信仰并没有太大变化，而“笑”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治愈效果，也是摇撼奄奄一息腐朽社会的一剂猛药。[④]

[①] 黄宝生 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昆仑出版社，2008 年，北京，第 36-37 页。

[②] Biswas, Bhagirathi. *Sanskrit Drama at a Glance*. Vol. I. Kolkata (India): Sanskrit Pustak Bhandar, 2013.

[③] Ramaratnam, S. *Sanskrit Dram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ahasana and Vīthī*. New Delhi: D. K. Printworld, 2014, pp. vii-viii, 414-41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引文，将随文标出该书标题首词（*Sanskrit*）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 Geetha, N. K., *Krīḍanīyakam: Myriad Faces of Comedy in Sanskrit Drama*. Kerala (India): Chinmay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Shodha Sansthan, 2012, pp. xii, xviii.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引文，将随文标出该书标题首词（*Krīḍanīyakam*）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罗摩拉特纳（S. Ramaratnam）的《梵语戏剧——以笑剧和街道剧为中心》（*Sanskrit Dram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ahasana and Vīthī*, 2014）是对梵语戏剧文学中的笑剧和街道剧的第一次系统研究。这部著作收集了尽可能多的写本、微缩胶片和原本副本，力求完整展现笑剧和街道剧中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方面。（*Sanskrit*: v-viii）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导论，包括梵语戏剧的起源和分类等。第二章概述味论和滑稽味，还包括滑稽味对应的天神、色彩、与其他味的关系及其在梵语文学中的应用案例。第三章探讨梵语笑剧的理论和实践。第四章考察笑剧中的单纯类型（śuddha）。第五章考察笑剧中的混合类型（saṃkīrṇa），又分为大笑剧和小笑剧两个分支。第六、七章分别探讨街道剧的理论与案例分析。第八章讲梵语戏剧中的街道剧支（vīthyaṅga），以跋娑戏剧、迦梨陀娑戏剧、《小泥车》（*Mṛcchakaṭika*）、《指环印》（*Mudrārākṣasa*）、《结髻记》（*Veṇīsaṃhāra*）、《后罗摩传》（*Uttararāmacarita*）、《茉莉和青春》（*Mālatīmādhava*）、《觉月升起》（*Prabodhacandrodaya*）、俗语戏剧《迦布罗曼阁利》（*Karpūramañjalī*）及笑剧中的街道剧支为例。第九章结论，在总结和回顾之前研究的同时，讨论街道剧和印度民间戏剧的关系，范围直到十九世纪，包括盛行于孟加拉、奥里萨、东比哈尔一带的游行戏（jātrā），马哈拉施特拉的塔玛莎音乐戏（tamāśā），北方邦、拉贾斯坦、旁遮普的诺丹姬公主戏（nauṭaṅkī），古吉拉特的巡回戏（bhavai），卡纳塔克的药叉节戏（yakṣagāna），泰米尔纳德的街道戏（therukkūttu）。（*Sanskrit*: 415-422）附录包括二十世纪作家作品及梵语笑剧和街道剧对印度其他语言戏剧和对英语文学中闹剧的影响。（*Sanskrit*: viii-ix）

罗摩拉特纳在考察笑剧和街道剧的起源和发展时发现，虽然二者在产生之初妙趣横生、生机勃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放缓了脚步。笑剧的思想、形式及富于克制的崇高气质见于《薄伽梵和妓女》等早期作品，却在语言上逐渐衰落。笑剧的一大功用就是展现特定时期印度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真实形态。笑剧作者品位的下滑折射出他们所处社会的倾向。或许这些作家不应被指责，因为这些作品的产生也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需求，然而过火的表演确实归功于他们。笑剧成了作者嘲笑和辱骂一切他们不认可之物的借口，不再具有文学追求和人文关怀。事实上，如果作家足够严肃，他可以通过笑剧启发思考、改造社会，没有人禁止他们这样做。在后期笑剧中依然可以发现《罗摩击掌》（*Rāmapāṇivāda*）和《爱旗传》（*Madanaketucarita*）这样秉承笑剧古典传统的作品。（*Sanskrit*: 411-412）

吉萨（N. K. Geetha）的《玩物——梵语喜剧的多重面孔》（*Krīḍanīyakam: Myriad Faces of Comedy in Sanskrit Drama*, 2012）同样关注笑剧，围绕“笑”探讨“玩物”

（krīḍanīyaka）和滑稽味。全书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概述吠陀、奥义书、往世书和史诗中的幽默情节。第二部分讨论滑稽味在戏剧中的沿革。第三部分列出了各种戏剧理论著作中关于滑稽味的探讨。第四部分例举梵语戏剧中的喜剧场景。第五部分讲梵语戏剧中的丑角。第六部分讨论《薄伽梵和妓女》和《醉鬼传》这两部笑剧作品中的滑稽味。第七部分为结论。这部专著结合梵语戏剧文本从不同角度探讨滑稽味，并提供了大量文本例举和文论阐释，可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印度的表演传统可以追溯至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文献记载的前婆罗多时期表演活动，虽然没有严整的结构，却具有大众娱乐的性质。婆罗多的《舞论》为戏剧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将戏剧表演从街头移置到更加封闭的神圣空间（剧院），规定在戏剧表演之前需要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从而将街头杂耍提升到艺术高度。（*Krīḍanīyakam*: ix-x）四吠陀供婆罗门祭祀之用，作为第五吠陀的戏剧很可能是宗教祭祀的扩大化，也就是适用于广大民众的更为通俗的祭祀版本。由此可见，戏剧在诞生之初就同时具有祭祀和娱乐的功能。吉萨认为滑稽味（hāsya）拥有众多可能性，以丑角（vidūṣaka）为人格化表现，是所有味中最重要的味。（*Krīḍanīyakam*: xv-xviii）在这个语境下，玩物（krīḍanīyaka）这个词将戏剧与笑、欢乐、滑稽味结合在一起。英语中的“play”同时是戏剧表演和纯粹的无功利的玩耍。（*Krīḍanīyakam*: 40-41）汉语中的“戏”也同时是戏剧和游戏。天神将戏剧视为娱乐。梵天在其中加入了伦理道德。玩物正是象征了戏剧的社会和宗教功能——既是取悦众生的最高娱乐，又是与黑天的嬉戏（līlā）相似的神性游戏。（*Krīḍanīyakam*: x）

保禄（K. G. Paulose）为梵语戏剧理论的发展标记了三个时间节点：公元前二世纪的《舞论》（*Nāṭyaśāstra*）；公元九世纪的《暗示注》（*Vyaṅgyavyākhyā*）；十五世纪的《舞钩》（*Naṭāṅkuśa*）。其中《暗示注》是对《舞论》表演技巧的即兴发挥，《舞钩》则代表族顶（Kulaśekhara）继任者中的反叛力量。[①]

保禄的《暗示注——戏剧舞台上的韵美学》（*Vyaṅgyavyākhyā: The Aesthetics of Dhvani in Theatre*, 2013）以《暗示注》（*Vyaṅgyavyākhyā*）的翻译和研究为基础，围绕梵语戏剧中韵的理论和审美特质展开。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暗示注》。第二部分介绍十世纪之前的梵语戏剧情况。第三部分是《胜财韵》（*Dhanañjayadhvani*）和《隐男韵》（*Saṃvaraṇadhvani*）的文本翻译，包括《暗示注》写本的照片、梵语原文和英译。第四部分是族顶之后戏剧的发展情况，包括古提亚达姆梵剧（kūṭiyāṭṭam）的

[①] Paulose, K. G., ed. *Vyaṅgyavyākhyā: The Aesthetics of Dhvani in Theatre*. New Delhi: Rashtriya Sanskrit Sansthan, 2013, p. vii-viii.

概况。王室梵剧作家族顶（Kulaśekhara）创作了两部梵剧：《妙贤和胜财》（*Subhadrādhanañjaya*）和《炎娃和隐男》（*Tapatīsaṃvaraṇa*）。族顶为这两部戏剧中每位角色规定的表演方法形成了《胜财韵》（*Dhanañjayadhvani*）和《隐男韵》（*Saṃvaraṇadhvani*），二者合称《暗示注》。这是剧作家第一次为自己的剧本设定舞台脚本。[①] 人们在熟知剧情的情况下观赏戏剧，不是因为故事是什么，而是演员如何表演。族顶认为剧本只是种子，演员则像是农夫，必须将种子培育成树，也就是演出被剧作家隐藏的那部分沉默的“韵”。这种由演员向观众解码这些隐含意义的“暗示表演”是族顶在戏剧表演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新。从这一角度来讲，《暗示注》对于戏剧的重要性，就相当于新护（Abhinavagupta）的《韵光注》（*Dhvanyālokalocana*）对文学的重要性。保禄希望通过为学界提供《暗示注》（*Vyaṅgyavyākhyā*）和《舞钩》（*Naṭāṅkuśa*）（1993 年出版）丰富古典戏剧研究理论。[②]

（二）宗教文学研究——以梵语佛教文学为例

佛教诗人和剧作家马鸣（Aśvaghoṣa）留下《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和《美难陀传》（*Saundarananda*）两部梵语叙事诗和包括《舍利弗》（*Śāradvatīputra-Prakaraṇam*）在内的三部梵语戏剧残卷。黄宝生先生的《梵汉对勘佛所行赞》（2015）[③]是《佛所行赞》梵本[④]和昙无谶汉译的对勘研究。昙无谶汉译共二十八品，梵本仅存十四品。书中探讨梵本的修辞手法、诗律形式、佛教思想等内容并提供现代汉语译文，也对昙无谶所译后十四品进行注释。《梵汉对勘佛所行赞》是国内第一次运用梵语原文系统研究《佛所行赞》，也是世界上将《佛所行赞》梵本与汉译对勘研究的第一例。马鸣的三件梵语戏剧残卷由德国学者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于 1911 年整理出版。印度学者塔德帕雷（M. G. Dhadphale）在吕德斯研究基础之上，出版专著《舍利弗——马鸣的梵语戏剧》（*Śāradvatīputra-Prakaraṇam: A Sanskrit Drama of Aśvaghoṣa*, 2013）[⑤]，考察《舍利弗》残卷的语言特色、艺术手法及其在梵语戏剧史和佛教传统中的地位和意义。

另一部重要佛教文学作品《天譬喻经》由安迪·罗特曼（Andy Rotman）译出。《神圣故事——〈天譬喻经〉（I）英译》（*Divine Stories: Divyāvadāna Part I*, 2008）[⑥]包括梵本《天譬喻经》三十六个故事中十七个故事的英译和注释。翻译使用考威尔（E. B.

---

① Paulose, K. G., ed. *Vyaṅgyavyākhyā: The Aesthetics of Dhvani in Theatre*, p. viii.
② Paulose, K. G., ed. *Vyaṅgyavyākhyā: The Aesthetics of Dhvani in Theatre*, pp. vii-ix, 40-44.
③ 黄宝生 著，《梵汉对勘佛所行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④ Johnston, E. H. *The Buddhacarita, or Acts of the Buddh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95.
⑤ Dhadphale, M. G. *Śāradvatīputra-Prakaraṇam: A Sanskrit Drama of Aśvaghoṣa*. Pune (India): Sāvitrī Prakashan, 2013.
⑥ Rotman, Andy. *Divine Stories: Divyāvadāna Part I*.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8.

Cowell）和尼尔（R. A. Neil）编订的梵本[①]，同时参考吠底耶（P. L. Vaidya）和沙克尔顿·贝利（D. R. Shackleton Bailey）等学者的相关成果。

（三）更为广阔的交叉学科

广义的文学概念，包括文本、文献、铭刻等文字记载，甚至可以拓展到文化、物质文化乃至哲学、历史、思想史等范畴。

切鲁里（A. Cerulli）的《身体教程——叙述印度医书中的患病状态和疾病》（*Somatic Lessons: Narrating Patienthood and Illness in Indian Medical Literature*, 2012）以阿育吠陀和梵语七幕剧《生命之喜》（*Jīvānandanam*）为例，考察印度医学的文学和宗教的历史、医学故事的社会暗示和特定疾病的伦理内涵。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导论，包括全书的写作计划。第二章以梵语文献《阇拉迦本集》（*Carakasaṃhitā*）和《苏室卢塔本集》（*Suśrutasaṃhitā*）为基础，探讨印度医学文书中的病人身体，讲述医学的真实历史和神话历史，最后论及传统阿育吠陀中的各种人体解剖学，并概述疾病分类、预防和治疗的相关资料。第三章考察与发烧相关的叙事。第四章考察与流产相关的叙事。第五章考察国王的病。第六章讨论欢君（Ānandarāyam）在十七、十八世纪写成的梵语七幕剧《生命之喜》（*Jīvānandanam*）。第七章为结论。[②]

印度传统医学文献“阿育吠陀”（Āyurveda，又译“生命吠陀”、“长寿吠陀”）可以在《阿达婆吠陀》的除病咒语中窥见端倪，又见于宗教文学（《摩诃婆罗多》、往世书等）和《法论》、《利论》等道德政治法律著作。阿育吠陀中的医学文学，在印度历史中的宗教、哲学和文学等各类知识的产生中扮演重要角色。与医学相关的故事绝对数量不多，医学叙事在医学论述中占据的位置也很有限，但如果缺失对这些故事的研究，我们就失去了借以理解印度医学和宗教历史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很大部分。医药在印度常常被用于宗教控制。例如《迦叶波本集》（*Kāśyapasaṃhitā*）专论蒜的治愈功效一章中讲到蒜的神话起源。因陀罗（Indra）的妻子因陀罗尼（Indrāṇī）一百年未孕。因陀罗让妻子喝甘露。因陀罗尼喝饱后打嗝，喷出一些在地上。这些被因陀罗尼喷出的甘露就变成了蒜。因此，蒜气味难闻，是再生族的禁忌，但具有重生的功效。蒜的神话源头还显示了甘露的世俗化过程，就像知识原本是特权阶级专享，却也可以被大众接近。每个人都会生病。生理和心理在健康和疾病之间的波动是人类存在过程的标

[①] Cowell, E. B., and R. A. Neil, eds. *The Divyâvadâna, 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 Now First Edited from the Nepalese Sanskrit Mss. in Cambridge and Paris*.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886

[②] Cerulli, Anthony. *Somatic Lessons: Narrating Patienthood and Illness in Indian Medical Literatu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10-12.

志。阿育吠陀常常用故事来解释人们的病因，不仅解释疾病如何产生（例如被污染的水如何产生了痢疾？），还解释关于疾病的各种为什么（例如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一天之前？）。于是医学文献就成为在印度历史的特定文化视域下考察健康和疾病成因的透视镜，这涉及医学领域，也关涉宗教和政治制度。梵语医书的编纂者用传统叙述方式以健康人展现社会和宗教的完整形态，而将病人描述为需要被治愈、需要被改造的形象。阿育吠陀不仅具有治愈效果，而且具有社会和宗教的限定性。[①] 疾病并非严格意义上生理或心理疾病，而更多是在社会伦理甚至宗教范畴。疾病被认为是对正法的另外阐释，也就是说，生病的人因为受凉或是吃了被污染的东西，但被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作为违背社会规范的惩罚。印度医学文献的历史，本质上其实是印度宗教史。

班纳吉（Manabendu Banerjee）的《梵语建筑文献》（*Aspects of Sanskrit Architectural Texts*, 2010）虽可以被认为是广义的文学作品，事实上也与印度医书一样，本质属于宗教文化史的范畴。全书分十五章：一、关于翻译梵语建筑文献的一些问题；二、古代梵语文献中的建筑元素；三、砖产业与砖建筑；四、石头；五、木头；六、选址与土地检测；七、选址规划与城市规划；八、宫殿（prāsāda）；九、祠堂建筑（maṇḍapa）；十、石膏（vajralepa）与石灰（sudhā）；十一、《鱼往世书》中关于印度建筑和雕刻的章节；十二、《女神往世书》中的印度艺术；十三、《大地王胜诗》（*Pṛthvīrāja-vijaya-kāvya*）中艺术和建筑的例举；十四、门；十五、余甘子（Āmalaka）。

印度拥有一批讲述建筑、雕刻和绘画的梵语文献，统称事论（vāstuśāstra）。这些文献近年来才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吠陀文献中我们就可以见到描述建筑技巧的雏形。一些主要的往世书中也包含关于建筑、雕刻和绘画的叙述。专门讲述建筑的文献大约在八、九世纪产生。事明（vāstuvidyā）或称建筑学包括了大批文献，例如未署名的《建筑精华》（*Mānasāra*），《房屋设计》（*Mayamata*），波阇（Bhoja）的《建筑提要》（*Samarāṅgana-sūtradhāra*）和伐腊诃弥醯拉（Varāhamihira）的《广本集》（*Bṛhatsaṃhitā*）和《无敌问》（*Aparājitapṛcchā*），室利鸠摩罗（Śrikumāra）的《工艺宝》（*Śilparatna*），密宗文献《伊沙那湿婆古鲁提婆手册》（*Iśāna-Śivagurudeva-paddhati*）等。已有学者对印度艺术和建筑领域贡献专论。[②] 班纳吉的这部专著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梵语文献中涉及建筑的内容为基础，着重考察寺庙建筑的材料、选址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①] Cerulli, Anthony. *Somatic Lessons: Narrating Patienthood and Illness in Indian Medical Literature*, pp. 1-9.

[②] Banerjee, Manabendu. *Aspects of Sanskrit Architectural Texts*. Kolkata: Sāraswat Kunja, 2010, 前言.

三、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

梵语文学与宗教、哲学、文化、历史等诸多门类交织在一起，其外延几乎可以扩展到印度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在考察近年出版的梵语文学研究专著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我们信手拈来的任何一部印度文学作品甚至印度文学研究专著或许都会有其他学科的影子。印度学研究领域内部的学科交叉一直存在。而这个交叉学科的趋势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扩大，已不仅仅是人文学科之中的类别，如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还拓展到所有学科之间，例如文学与医学，与建筑，与环境，与科技等等，并且也已不仅仅是学科间的交叉，还包括地域间的交叉，文化传统间的交叉，兼具时间和空间的跨度。

借用《普林斯顿佛教辞典》（*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 2014）前言中概述佛学研究的话：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佛学研究有很多新的变化。有一些情况变得更糟了，比如我们现在很少能遇到像路易斯·德·拉·瓦莱·普森（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和他的学生艾蒂安·拉莫特（Msgr. Étienne Lamotte）那样精通梵语、巴利语、汉语、日语和藏语的语言天才和佛学大师。然而我们也有一些全新的进展。之前佛学研究主要局限在印度文献，对汉语文献少有关注。现在，汉译佛典和藏译佛典对于补足缺失的印度原典的重要价值已成为共识，韩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地区佛教和佛学研究也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另外，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新兴佛教信徒和佛学研究者，同样成为一个佛学发展的新传统。[①] 伴随考古领域的新成就，犍陀罗语佛典为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佛教文献的研究，从单一文本拓展到同类文献的不同语言传抄本或译本的平行研究，又拓展到地域和学科间的交叉研究。

梵语文学研究也面临着与佛学研究相似的遭遇和机遇。一方面是大师的远去，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日渐衰微，另一方面是一些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新发展。传统的梵语文学研究持续推进。这与中国文学在国内的持续发展和近年来国学研究的回暖类似。然而事实上，以印度本土为例，虽然传统的梵语史诗文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从未中断，但是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当罕见。绝大部分为之前著作的重印。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本位的问题。一方面，文学的研究者需要在纯文学的领域探讨文学的审美价值，但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兼顾作品的现代特征，或者说古典作品在当今时代的新的解读。从整体趋势来看，梵语文学研究在与西方现代理论结合的同时，呈现出学科间交叉融合的趋势。各国学者从自身的文化和兴趣点出发，纯粹的梵语文

[①] Buswell Jr., Robert E. and Donald S. Lopez Jr. *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vii。

学研究的领地逐渐被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侵吞殆尽，但也在这种“变形”和学科碰撞中获得了新的生机。

梵语文学与印度宗教特别是佛教的结合已相当常见。交叉学科研究中比较显著的内容也是文学与宗教乃至宗教文献之间的交叉研究。例如罗伯特·德卡洛里（Robert DeCaroli）的《萦绕佛陀——印度流行宗教和佛教的诞生》（*Haunting the Buddha: Indian Popular Relig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m*, 2004）[①]。德卡洛里认为，早期佛教僧众承载了他们所在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并未在加入僧团后抛弃自己之前的鬼怪信仰。新信仰为他们的旧信仰提供了解释空间，由是印度本土宗教中的鬼神、魂灵等元素融入早期佛教典籍之中。凭借文本和图像的证据，德卡洛里完整展现了印度民间宗教对佛教思想的影响。内奥米·阿普尔顿（Naomi Appleton）的《讲述业与轮回——佛教和耆那教的转生故事》（*Narrating Karma and Rebirth: Buddhist and Jain Multi-life Stories*, 2014）[②] 则是佛教与耆那教叙事对比研究的实例。佛教和耆那教这两个宗教传统的文学作品包含了大量前世、来生的故事，用以揭示业报轮回、转世解脱等思想。阿普尔顿考察佛传、耆那传、僧传等文献中轮回的不同层次，在关注宗教中个体命运的同时，为南亚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不同语言佛典传本的对勘研究、不同宗教派别的对比研究的同时，佛教文学研究被放置到更大范围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领域。

此外，一些在梵语文学内部之前未被关注的内容，如医学文学、建筑文学等，也开始进入学界视野。这一方面源自梵语文学与现代文论、当代思潮、当代政治的结合。例如女性主义。温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对于戒日王两部宫廷喜剧的解读，就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另一方面则是源自实用主义的理念，企图将梵语文学打造成经世致用之学。如梵语文学与医学、建筑学等实用科学的结合。这也与整个学术界重理轻文的思潮相连。在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变，纯粹的文学研究被逐步消解的大环境之下，梵语文学的研究也面临这样逐步沦为史料和研究工具的困境。纯粹的梵语文学研究在绝大部分梵学家那里失去宠幸。梵学家们一部分与宗教哲学相结合，一部分则与历史地理纠缠不清，再有则上溯至吠陀梵语，将文学研究与语法逻辑的推演结合在一处。

在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兴起主要与佛学研究相伴。古典梵语文学研究若要在边

[①] DeCaroli, Robert. *Haunting the Buddha: Indian Popular Relig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4.

[②] Appleton, Naomi. *Narrating Karma and Rebirth: Buddhist and Jain Multi-life Sto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缘中求生，也需从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出发，在文学、文化、历史等交叉学科中取得突破。躁动不安的时代在寻找着自己的答案。很多问题是需要回归到对于人性的探索中才能得到解答。古老的印度，曾经源源不断赋予了我们无数灵感的火花，佛教思想也成为了构成中华文明儒释道渊源的三分之一。我们在研究梵语文学的时候，或许也是我们在寻找自我过程中的一种回归，或许也是我们解决时代困惑的一个途径。为了认识当下，我们必须了解过去。印度文明已融入我们的血液而成为我们过去的一部分。所以，认识印度，也就是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随着新材料、新传统的引入，不同语言、不同传统、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献呈现平行对比和交叉研究的趋势。梵语文学中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比较语言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文学内部不同学科甚至文学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愈演愈烈。艺术和考古的新发现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在文字记载的文献之外，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如寺庙建筑、宗教艺术等之前未被关注的领域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研究渐行渐远，与文学研究相关的边缘学科得到关注和发展。梵语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容纳无数其他学科的领域——我们既可以加诸其上众多炫丽的元素，也可以兼顾时代特征给予全新解读。正如哈德孙在专著《令人迷惑的正法——〈摩诃婆罗多〉中的受难伦理和美学》中所述：之前的西方学者认为《摩诃婆罗多》是杂乱无章的对话的堆砌，是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拼凑，是史料，是宗教，是神话，但不具有文学价值。所幸近几十年的研究逐渐肯定了《摩诃婆罗多》的文学价值。它的规模，它的谜团，它的精巧构思，它的开放式结局，它的阴暗的世界观，都是史诗独特文学才华的有机组成。（*Disorienting*: 20-21）文学是一个丰富的门类，可以拓展到文本、文献、史料的更广阔领域。作为文学研究者，在将文学的功用和范畴无限放大的时候，如果能够从文学的审美特征出发，并兼顾这些审美特征的时代解读，或许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收获。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课题《戒日王戏剧翻译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09@zh019（220100020015）。本文得到美国新校大学印度中国研究所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胡朗